

主编 李天纲

中国国家图书馆藏

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·经济学（第五辑）

# 经济学及赋税之原理

〔英〕里嘉图 (David Ricardo) 著 郭大力 王亚南 译



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 
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

主编 李天纲  
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 
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·经济学（第五辑）

# 经济学及赋税之原理

〔英〕里嘉图（David Ricardo）著 郭大力 王亚南 译



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 
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经济学及赋税之原理/ (英) 里嘉图 (Ricardo, D.) 著; 郭大  
力, 王亚南译. —上海: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, 2016

(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/李天纲主编. 经济学)

ISBN 978-7-5520-1193-7

I. ①经… II. ①里…②郭…③王… III. ①古典资产阶级政  
治经济学 IV. ①F091.33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046241号

---

## 经济学及赋税之原理

主 编: 李天纲

编 纂: 赵 炬

责任编辑: 唐云松

特约编辑: 陈宁宁

封面设计: 清 风

策 划: 赵 炬

执 行: 取映文化

加工整理: 嘎 拉 江 岩 牵 牛 莉 娜

责任校对: 笑 然

出版发行: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

上海淮海中路622弄7号 电话63875741 邮编200020

<http://www.sassp.org.cn> E-mail: sassp@sassp.org.cn

排 版: 上海永正彩色分色制版有限公司

印 刷: 常熟市人民印刷厂

开 本: 650×900毫米 1/16开

字 数: 280千字

印 张: 23.875

版 次: 2016年4月第1版 2016年4月第1次印刷

---

ISBN 978-7-5520-1193-7/F.387

定价: 110.00元 (精装)

# 民国西学：中国的百年翻译运动

——『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』序

李天纲

继唐代翻译印度佛经之后，二十世纪是中文翻译历史上的第二个高潮时期。来自欧美的『西学』，以巨大的规模涌入中国，参与改变了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，这在人类文明史上也是罕见的。域外知识大规模地输入本土，与当地文化交流信息，激发思想，乃至产生新的理论，全球范围也仅仅发生过有数的那么几次。除了唐代中原人用汉语翻译印度思想之外，公元九、十世纪阿拉伯人翻译希腊文化，有一场著名的『百年翻译运动』之外，还有欧洲十四、十五世纪从阿拉伯、希腊、希伯来等『东方』民族的典籍中翻译古代文献，汇入欧洲文化，史称『文艺复兴』。中国知识分子在二十世纪大量翻译欧美『西学』，可以和以上的几次翻译运动相比拟，称之为『中国的百年翻译运动』、『中国的文艺复兴』并不过分。

运动似乎是突如其来，其实早有前奏。梁启超（1873-1929）在《清代学术概论》中说：『自明末徐光启、李之藻等广译算学、天文、水利诸书，为欧籍入中国之始。』利玛窦（Matteo Ricci, 1552-1610）、徐光启、李之藻等人发动的明末清初天主教翻译运动，比清末的『西学』早了二百多年。梁启超有所不知的是：利、徐、李等人不但翻译了天文、历算等『科学』著作，还翻译了诸如亚里士多德《论灵魂》（《灵言蠡勺》）、《形而上学》（《名理探》）等神学、哲学著作。梁启超称明末翻译为『西学东渐』之始是对的，但他说其『范围亦限于天（文）、（历）算』，则误导了他的学生们一百年，直到今天。

从明末到清末的『西学』翻译只是开始，而且断断续续，并不连贯成为一场『运动』。各种原因导致了『西学』的挫折：被明清易代的战火打断；受清初『中国礼仪之争』的影响；欧洲在1713年禁止了耶稣会士的传教活动，以及儒家保守主义思潮在清代的兴起。鸦片战争以后很久，再次翻译『西学』，仍然只在上海和江南地区。从翻译规模来看，以上海为中心的翻译人才、出版机构和发行组织都比明末强大了，影响力却仍然有限。梁启超说：『惟（上海江南）制造局中尚译有科学书二三十种，李善兰、华蘅芳、赵仲涵等任笔受。其人皆学有根底，对于所译之书责任心与兴味皆极浓重，故其成绩略可比明之徐、李。』梁启超对清末翻译的规模估计还是不足，但说『戊戌变法』之前的『西学』翻译只在上海、香港、澳门等地零散从事，影响范围并不及于内地，则是事实。

对明末和清末的『西学』做了简短的回顾之后，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：二十世纪的中文翻译，或曰中华民国时期的『西学』，才是称得上有规模的『翻译运动』。也正是在二十世纪的一百年中，数以千计的『汉译名著』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必读教材。1905年，清朝废除了科举制，新式高等教育以新建『大学堂』的方式举行，而不是原来尝试的利用『书院』系统改造而成。新建的大学、中学，数理化、文史哲、政法等等学科，都采用了翻译作品，甚至还有西文原版教材，于是，中国读书人的思想中又多了一种新的标杆，即在『四书五经』之外，还必须参考一下来自欧美的『西方经典』，甚至到了『言必称希腊、罗马』的程度。

我们在这里说『民国西学』，它的规模超过明末、清末；它的影响遍及沿海、内地；它借助二十世纪的新式教育制度，渗透到中国人的知识体系、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中，这些结论虽然都还需要论证，但从一般直觉来看，是可以成立的。中国二十世纪的启蒙运动，以及『现代化』、『世俗化』、『理性化』，都与『民国西学』的翻译介绍直接有关。然而，『民国西学』到底是一个多大的规模？它是一

个怎样的体系？它们是以什么方式影响了二十世纪的中国思想？这些问题都还没有得到认真研究，我们并没有一个清晰的认识。还有，哪些著作得到了翻译，哪些译者的影响最大？『西学东渐』的代表，明末有徐光启，清末有严复，那『民国西学』的代表作在哪里？这一系列问题我们并不能明确地回答，原因就在我们对民国翻译出版的西学著作并无一个全程的了解，民国翻译的那些哲学、社会科学、人文学科的『西学』著作，束之高阁，已经好多年。

举例来说，1935年，上海生活书店编辑《全国总书目》，『网罗全国新书店、学术机关、文化团体、图书馆、政府机关、研究学会以及个人私家之出版物约二万种』。就是用这二万种新版图书，生活书店编制了一套全新分类，分为：『总类、哲学、社会科学、宗教、自然科学、文艺、语文学、史地、技术知识』。一瞥之下，这个图书分类法比今天的『人大图书分类法』更仔细，因为翻译介绍的思潮、学说、学科、流派更庞大。尽管并没有统一的『社科规划』和『文化战略』，『民国西学』却在『中国的文艺复兴』运动推动下得到了长足发展。查看《全国总书目》（上海，生活书店，1935），在『社会科学·社会学一般·社会主义』的子目录下，列有『社会主义概论、社会主义史、科学的社会主义、无政府主义、基尔特社会主义、乌托邦社会主义、基督教社会主义、议会派社会主义』等；在『社会科学·政治·政体政制』的子目录下，列有『政治制度概论、政治制度史、宪政、民主制、独裁制、联邦制、各种政制评述、各国政制、中国政制、现代政制、中国政制史』等，翻译、研究和出版，真的是与欧美接榫，与世界同步。1911年以后的38年的『民国西学』为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打下了扎实的基础，而我们却长期忽视，不作接续。

编辑出版一套『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』，把中华民国在大陆38年期间翻译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著作重新刊印，对于我们估计、认识和研究『中国的百年翻译运动』、『中国的文艺复兴』，接续当

时学统，无疑是有着重要的意义。1980年代初，上海、北京的学术界以朱维铮、庞朴先生为代表，编辑『中国文化史丛书』，一个宗旨便是接续1930年代商务印书馆王云五主编『中国文化史丛书』，重振旗鼓，『整理国故』，先是恢复，然后才谈得上超越。遗憾的是，最近三十年的『西学』研究却似乎没有采取『接续』民国传统的方法来做，我们急急乎又引进了许多新理论，诸如控制论、信息论、系统论……还有『老三论』、『新三论』、『后现代』、『后殖民』等等新理论，对『民国西学』弃之如敝屣，避之唯恐不及。

民国时期确实没有突出的翻译人物，我们是指像严复那样的学者，单靠『严译八种』的稿酬就能成为商务印书馆大股东，还受邀担任多间大学的校长，几份报刊的主笔。但是，像王造时（1903-1971）先生那样在『西学』翻译领域做出重要贡献，然后借此『西学』，主编报刊、杂志，在『反独裁』、『争民主』和『抗战救国』等舆论中取得重大影响的人物也不在少数。王造时的翻译作品有黑格尔的《历史哲学》、摩瓦特的《近代欧洲外交史》、《现代欧洲外交史》、拉铁耐的《美国外交政策史》、拉斯基的《国家的理论与实际》、《民主政治在危机中》。1931年，王先生曾担任光华大学教授，文学院院长，政治系主任，后来创办了《主张与批评》（1932）、《自由言论》（1933）、组织『中国民权保障同盟』（1932）。他在上海舆论界发表宪政、法治、理性的自由主义，他在大学课堂上讲授的则是英国费边社社会主义、工联主义和公有化理论（见王造时著《荒谬集·我们的根本主张》，1935，上海，自由言论社）。非常可惜的是，王造时先生这样复杂、混合而理想主义的政治学理论和实践，在最近三十年的社会科学、人文学科中并无讨论，原因显然是与大家不读，读不到，没有再版其作品有关。

我们说，『民国西学』本来是一个相当完备的知识体系，在经历了一个巨大的『断裂』之后，学者并没有好好地反省一下，哪些可以继续和发展，哪些应该批判和扬弃。民国时期好多重要的翻译著作，我

们都没有再去翻看，认真比较，仔细理解。「改革、开放」以后，又一次「西学东渐」，大家只是急着去寻找更加新颖的「西学」，用新的取代旧的，从尼采、弗洛伊德……到福柯、德里达……就如同东北谚语讽刺的那样：「熊瞎子掰包谷，掰一个丢一个。」中国学者在「西学」宝库中寻找更新式的装备，在层出不穷的「西学」面前特别害怕落伍。这种心态里有一个幻觉：更新的理论，意味着更确定的真理，因而也能更有效地在中国使用，或者借用，来解决中国的问题。这种实用主义的「西学观」，其实是一种懒惰、被动和浮躁的短视见解，不能积累起一个稍微深厚一点的现代文化。

讨论二十世纪的「西学」，一般是以五四「新青年」来代表，这其实相当偏颇。胡适、陈独秀等人固然在介绍和推广「西学」，倡导「启蒙」时居功至伟，但是「新文化运动」造成不断求新的风气，也使得这一派的「西学」浅尝辄止，比较肤浅，有些做法甚至不能代表「民国西学」。胡适先生回忆他们举办的《新青年》杂志，有一个宗旨是要「输入学理」，即翻译介绍欧洲的社会科学、人文学科知识，他还大致理了一个系统，说「我们的《新青年》杂志，便曾经发行过一期「易卜生专号」，专门介绍这位挪威大戏剧家易卜生，在这期上我写了首篇专论叫《易卜生主义》。《新青年》也曾出过一期「马克思专号」。另一个《新教育月刊》也曾出过一期「杜威专号」。至于对无政府主义、社会主义、共产主义、日耳曼意识形态、盎格鲁·萨克逊思想体系和法兰西哲学等等的输入，也就习以为常了。」（唐德刚编译：《胡适口述自传》，北京，华文出版社，1992年，第191页）。胡适晚年清理的这个翻译目录，就是那一代青年不断寻找「真理」的轨迹。三四十年间，他们从一般的人性论学说，到无政府主义、社会主义、马克思主义；从不列颠宪政学说，到法兰西暴力革命理论、德意志国家主义思想，再到英格兰自由主义主张，大致就是「输入学理」运动中的全部「西学」。

胡适一语道破地说：「这些新观念、新理论之输入，基本上为的是帮助我们今日所面临的实际



问题。」胡适并不认为这种「活学活用」、「急用先学」的做法有什么不妥。相反，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接受「西学」的方法论，大多认为翻译为了「救国」，如同进口最新版本的克虏伯大炮能打赢仗，这就是「天经地义」。今天看来，这其实是一种庸俗意义的「实用主义」，是生吞活剥，不加消化，头痛医头，脚痛医脚的简单思维，或曰：是「夺他人之酒杯，浇自己之块垒」。从我们收集整理「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」的情况来看，「民国西学」是一个比北大「启蒙西学」更加完整的知识体系。换句话说，我们认为「五四运动」及其启蒙大众的「西学」并不能够代表二十世纪中国西学翻译运动的全部面貌，在北大「启蒙西学」之外，还有上海出版界翻译介绍的「民国西学」。或许我们应该把「启蒙西学」纳入「民国西学」体系，「中国的百年翻译运动」才能得到更好的理解。

我们认为：中国二十世纪的西学翻译运动，为汉语世界增加了巨量的知识内容，引进了不同的思维方式，激发了更大的想象空间，这种跨文化交流引起的触动作用才是最为重要的。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化变得不古不今，不中不西，并非简单的外来「冲击」所致，而是由形形色色的不同因素综合而成。外来思想中包含的进步观点、立场、方案、主张、主义……具有普世主义的参考价值，但都要在理解、消化、吸收后才能成为汉语语境的一部分，才会有更好的发挥。在这一方面，明末徐光启有一个口号可以参考，那便是「欲求超胜，必须会通」；会通之前，必先翻译」。反过来说，「翻译」的目的，是为了中西文化之间的融会贯通，而非搬用；「会通」的目的，不是为了把新旧思想调和成良莠不分，而是一种创新——「超胜」出一种属于全人类的新文明。二十世纪的「民国西学」，是人类新文明的一个环节，值得我们捡起来，重头到底地细细阅读，好好思考。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邀我主编「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」，献弁言于此，是为序。

2016年3月20日，于阳光新景寓所

[英] 裏嘉圖 (David Ricardo) 著 郭大力 王亞南 譯

# 經濟學及賦稅之原理

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四月出版

## 譯序

### 一 里嘉圖眼前的經濟問題

我喜歡讀里嘉圖的經濟學，並非因為他書中的文字，具有一種特殊的吸引力的美，他這一本大著、文字是晦澀的；亦非因為他這書的編次，具有一種於讀者便利的系統，他這一本名著，祇是三十二篇亂七八糟的論文集。他這書的偉大，在於他真切表現了當時的經濟問題。

在亞當斯密時代，工業革命尚未完全發展。對於製造家的工業，企業家的商業，社會上尚有各種束縛。在上等階級方面，尚有禁止穀物輸入，而為貴族地主謀利益的穀物條例；在下等階級方面，尚有限制工人自由，以防範相互競爭的基爾特組織。這時候，在資本家方面，尚沒有企業的投資的自由；而在勞働者方面，亦沒有勞働的擇業的自由。

所以，在亞當斯密時代，唯一的經濟問題，是摧毀這種種束縛，讓社會上的大工業發展。在亞當斯密看來，這種種束縛的破除，不僅可能，而且必要。他以為，如果破除了這種種束縛，如果確立了

資本家的企業自由投資自由，確立了勞働者的勞働自由擇業自由，則大工業的發展，是指顧間事。

亞當斯密這種革命思想的重要，不減於盧騷的民約論。盧騷想在政治方面確立第三階級的自由，亞當斯密想在經濟方面，確立第三階級的自由，他們的口號，同是一個自由。

他們二人，還有一個相似之點，盧騷以為，在政治方面打倒專制暴力貴族權威之後，確立第三階級的自由，便是確立全國民的自由。亞當斯密亦以為，在經濟方面破除種種束縛之後，第三階級的利益，便是全國民的利益。

貫通亞當斯密『國富論』全書的中心思想，便是這種假設。所以他全書討論的，祇是如何發展大工業，如何確立第三階級自由的問題，但他全書的題名，却是：『諸國民之富的性質及其原因之研究』。他以為，資本家為自身利益，把資本投在於己最有益的事業上，亦即最有益於社會。

在亞當斯密心中，勞働階級與資本階級鬥爭的黑影，全不存在。後來階級鬥爭的慘狀，想在他整個的思想中，只有如何始可發展工業的問題，但工業發展之後，社會上究將受在他，實在難於想像。在他『國富論』中，如果偶爾言及了工業發展以後的結果，那他的結論工業發展於全社會有利。他不知道，隨生產問題而起的分配問題，會成為十九世紀二十世紀心問題。他只注意了經濟上的生產問題，未曾注意經濟上的分配問題。

但歷史告訴我們，工業發展的結果，決不如亞當斯密所想像。工業發展，對於勞働階級及資本階級，可以而且一定會發生極端相反的影響。於資本階級有利的，一定於勞働階級有害。所以，在特殊情狀下，工業發展不是國民之富的原因，祇是特殊階級之富的原因。

由工業發展而引起的社會上各種慘狀，終隨時代之推進而暴露。烏托邦社會主義的興起，乃為必要。聖西門，佛立埃，奧文輩的學說，遂大行於世。但在他們之前，還有一個思想家為我們所不可忽視的，是英國的威廉·高德文。

亞當斯密『國富論』的公表，是一七七六年間事，瓦特蒸汽機在工業上的實際應用，則始自一七八五年。亞當斯密去世，是一七九〇年間事，高德文『政治正義論』的著作，即始於亞當斯密死後之翌年。以空想共產主義資格而流行於勞働階級間的這部名著，對於罪惡窮困，則斷定其可滅絕，對於富裕階級的游惰，則直言其非正義。在這部書中，流出了對勞働階級同情的呼聲，對於工業發展工廠發達當時的社會狀況，加上了極嚴正的批評。

這部書的公表，暴露了當時英國社會的不安現象。亞當斯密所未曾眼見或未會提及的階級鬥爭，至是漸就發生，而有日甚一日的趨勢。分配問題的黑影，第一次印在人類腦中，而這一次印象的表現，不幸却是反對資本主義的呼聲。就尙未充分發展的資本主義的立場說，這可說是惡作劇了。

但尚未充分發展的資本主義，決不能因這種反抗呼聲而稍示退縮。爲促進這個過渡時期的必要，擁護資本主義的理論的出現，無論如何，亦不能避免。馬爾薩斯起來了，馬爾薩斯在第一版人口論中，便根據一種所謂自然法則，把高德文的理論駁倒。賴他這本不滿三百頁的著作的出現，反資本主義的滿天風雲，纔慢慢收斂起來。他肯定社會貧困的必要，認貧困爲自然法則作用的結果，故在人類生活上，絕對不能避免。一切救濟貧困提高工資改良工人待遇的要求，等於違反自然法則的妄言，有害於社會進步。

馬爾薩斯這種議論，對於資本主義的貢獻，不下於亞當斯密的自由放任論。但亞當斯密祇看到了一個生產問題，馬爾薩斯則因時代較後之故，再在生產問題之外，發現了一個分配問題。他認出了，生產問題的解決，不是分配問題的解決。所以，在第一版人口論中，他說：

「亞當斯密博士研究所揭的對象，是國民之富的性質與原因。但還有一種研究，也許更有趣味，即研究那種種有影響於國民幸福或社會下層階級（各國都以這階級佔大多數）幸福的原因。亞當斯密屢屢把這二種研究，混而爲一。我亦充分承認這兩個問題的密切關係，並且，就一般說，增加國富的原因，亦有增進下等人民幸福的趨勢。但這二種研究的實際關係，也許不如亞當斯密博士所說的那樣切近，至少，他不曾注意一種事實，即，社會財富的增進，並不增進勞働階級的幸福。」

在人口論最後訂正版中，他的意見，便更確定了。他改訂前言，說：

「亞當斯密研究所揭的對象，是國民之富的性質與原因。但還有一種研究，也許更有趣味，即研究那種種有影響於社會下層階級（各國都以這階級佔大多數）幸福的原因。亞當斯密屢屢把這二種研究，混而為一。這二問題，無疑有密切關係。但其關係之性質與程度如何，財富增進對於貧民狀況之影響又如何，他所敘述的，尙未能十分準確。……仔細考察一下，則知維持勞働的基金，不必隨財富增加而增加，若按比例而同時增加之事，則為絕無僅有了。」

馬爾薩斯對於經濟學的貢獻，在於他明白認識了分配問題的重要，馬爾薩斯對於資本主義的貢獻，在於他把社會上的貧困現象，歸因於人口的自然法則，而為資本主義解去一層重圍，把勞働運動的聲勢壓下。從馬爾薩斯的論調，我們知道當時英國的經濟問題，不外兩個，一為如何發展資本主義的問題，一為如何壓制社會主義的問題。前者的特色，是企圖打破生產上一切可能的束縛，後者是企圖把一切可能的束縛，加在勞働者身上。資本主義一方面要求自由，一方面壓制自由。

這是一種矛盾，但資本主義就在這種矛盾中發育。當時尙無人能認識這種矛盾的原因，從目的論的立足點說，固可由資本主義發展自身之內在要求而解釋，但從唯物論的立足點說，則當由資本主義尙未充分發展之事實而說明。反穀物條例同盟的成立，是一八三八年間事，穀物條例的明令廢止，是

一八四六年間事，保護政策的放棄，是一八五二年格萊斯登任財政大臣時所決定。人口論第一版公布之時，却爲一七九八年，最後訂正版的發行，亦不過一八二六年。所以，在馬爾薩斯生命尚未完畢之前，資本主義的發展，亦尚未達到相當繁榮的地步。這時，就使沒有馬爾薩斯，馬爾薩斯主義却一定會發生。當時資本主義的狀況，必須有馬爾薩斯這樣的辯護。

里嘉圖經濟學說的發生，亦應從同一見地解釋。他是馬爾薩斯的朋友。他的學說，亦是當時實際經濟問題的表現。什麼是當時的經濟問題呢？不嫌重複，可再述一遍，即：資本主義爲完成牠自身的任務起見，有完成牠自身的必要，但要完成牠自身，則對當時生產上種種束縛，必須實現自由的要

求，而對當時勞働運動的種種要求，必須加以不自由的束縛。

## 一一 里嘉圖的分配論

資本主義的命運，一方面可使我們悲悼，因爲在他尙未從封建束縛完全解放出來以前，即已引起反對自身的勞働階級的勢力，他方面又可使我們安慰，因爲在他尙未充分發展之前，每逢困難，都幸有救星。在這許多或大或小的救星之中，里嘉圖當然是最大的一個。他是擁護資本主義的一員虎將。他擁護資本主義的方法，不外兩途，即辯明企業自由的正當與勞働階級要求的非理。前者是他生產論



的一部，後者是他分配論的全體。前者承繼亞當斯密一脈相傳的自由主義思想，後者却爲他所創論，爲後世各不同學派的根據。所以，要知道里嘉圖的生產論，不讀里嘉圖的經濟學，亦未嘗不可由亞當斯密的國富論推知；但要瞭解近代各種重要的經濟學說，則非研究里嘉圖的分配學說不可。

里嘉圖自己，亦覺得他的分配論，在他全部學說中，是最重要最創造的一部分。所以在經濟學第一版序文中，他說：

「勞働，機械，資本聯合使用在土地上面，所生產的一切土地生產物，分歸社會上三個階級，即地主，資本家，與勞働者。地主有土地，資本家有耕作土地的資本，勞働者則以勞力耕作土地。

「全土地生產物在地租利潤工資的名義下，分歸各階級。……」

「這種分配，受支配於一定法則，確定這種法則，是經濟學上的主要問題。杜哥特，斯托亞特，斯密，薩伊，西斯曼底等人之著作，固曾改進這種科學，但關於地租利潤工資的自然程序，猶未能有令人滿意的主張。」

在他的分配論中，他認爲最重要的，是地租學說。所以他在同一序文中，說：「亞當斯密和上述數名家，因不曾瞭解正確的地租原理，所以在我看，都忽視了許多重要的真理。在地租問題尙未看透以前，要發現這種種真理，殆不可能。」這種說話，對於今日研究里嘉圖經濟學說的人，猶甚重